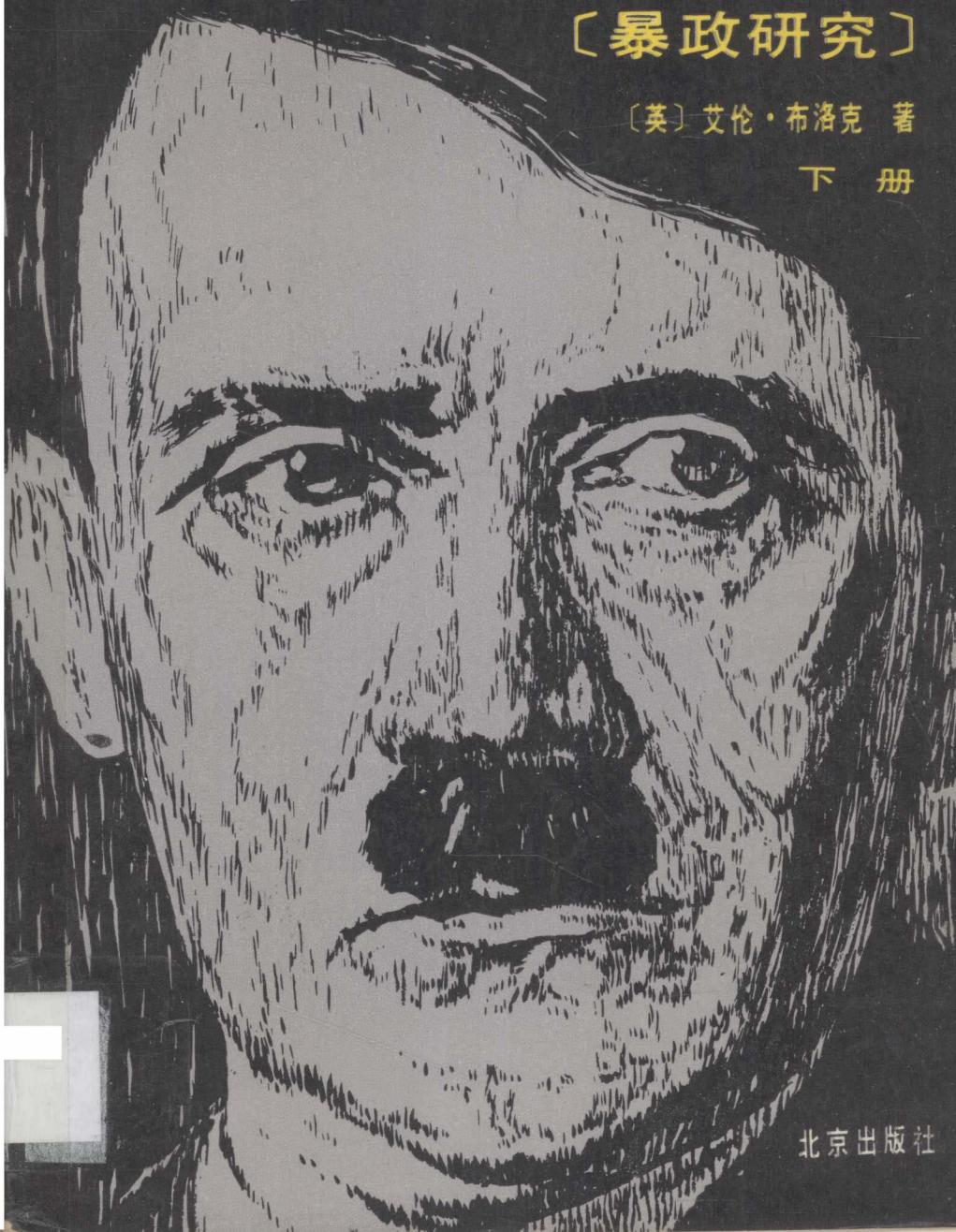


大独裁者希特勒

〔暴政研究〕

〔英〕艾伦·布洛克 著

下册



北京出版社

大独裁者希特勒

(暴政研究)

下 册

[英] 艾伦·布洛克 著

朱立人 黄鹂 黄佩铨 译

朱立人 校

北京出版社

第三卷

军 阀

1939—1945年

第十章 非决定性的胜利

1939—1940

—

随着战争的开始，希特勒愈益专注于政治和战略谋划，希望藉此赢得战争。他在公共场合露面少了，全部时间都用于外交活动和军事会议，他要对每一项需要作出的决定负责。由于这样一种地位的要求，他曾经享受过的一点私生活也牺牲了。如果说，在随后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有时很难寻找到他个人的形象，这倒并非完全由于保存下来的文件——会议记录、外交文件和军事指令——的性质使然，而是符合他在这些年代的实际生活情况。凡人消失了，融进到“元首”的历史形象中去了。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由于魔力开始失灵，人们才能够再次发现隐藏着的那个既非万世不朽、又非料事如神的凡人。

因此，尽管本书并不自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但这一卷的大部分必然主要论述的是作为纳粹德国军阀的希特勒，论述他面临的形势和他做出的决断。

一九三九年秋天，希特勒清楚地觉察到职业军人反对在西方发动扩大战争的进攻，尤其反对在他提出的时间，即这年的最后几个月发动进攻。他必须先消除这种反对意见，然后才能施行他的计划。为此，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陈述他的主张，并在十月十日举行的会议上向三军总司令以及哈尔德、凯特尔

宣读。

这份备忘录是结构严谨的精心之作。它开头就辩护说，德国必须在西方下手以防止法国人占领比利时与荷兰，并试图证明拖延时间对敌人有利，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国人的意向不明。

“没有任何条约或协定，”希特勒写道，“能够有把握地保证苏俄永远保持中立。目前，一切条件都不利于俄国放弃这种中立状态。但过八个月或一年，乃至于几年，这种局面可能会改变。”①

希特勒说到兴奋之处，抛弃了对低地国家实行预防性占领的论点，把他提出的作战行动的首要目标说成是全歼敌人的兵力。那些说明细节的段落着重强调了机动性、速度和装甲部队的集中，这表明希特勒当时已经在按照这些设想来考虑问题，这些设想于一九四〇年五、六月份付诸实施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希特勒急于要在秋季发动进攻，坚持主张对曾在波兰使用过的部队重新装备和补充的过程必须以一种可能是很不现实的速度来实施。他要求，如果必要时，进攻部队必须准备一直继续战斗到隆冬。希特勒论证说，他们能够办得到，只要他们坚持运动战而避免阵地战。关键是装甲师，“不能让它们陷进比利时城镇里无穷无尽的一排排房子中，它们根本没有必要进攻城市，而是……保持部队畅通无阻地前进，并集中突破敌方防守薄弱的阵地，以打破战线僵持不下的局面。”德军时刻牢记着这一点，不久行将横扫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在敌军未能形成连贯的防线之前就予以歼灭。希特勒最后强调需要“最大限度地”随机应变。至于进攻的时间，则“动手越早越好”。

希特勒的论点并没有扭转陆军的反对意见。在只须保持守势的时候无谓地扩大战争，在无须采取行动便大有可能取得一项折衷解决办法的时候迫使英法作战，在将军们看来，是一场

不负责任的赌博。希特勒自信德军比法军强大，将军们则不同意这种看法。希特勒认为装甲部队和空军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也表示怀疑。如果这场赌博不能得手，没有取得速胜的话，德国将发现自己已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觉得德国的资源不足以应付这样一场战争。

由于认识到希特勒不见得会容忍这种不同意扩大战争的独立见解，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和哈尔德（参谋总长）尽可能运用技术性的论据——重新装备陆军并把它从波兰调到西方的困难，冬季作战的种种风险，还有敌方兵力的强大等等。正如希特勒大谈什么坐待同盟国抢先动手将会带来危险作为幌子，来实行他认为再搞一次侵略行动也可侥幸取胜的想法一样，将军们也用夸大实际困难的办法来掩盖他们对希特勒的领导才能的不信任。在幕后，那帮曾经在一九三八年敦促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用武力除掉希特勒的人又活跃起来了；其中有前参谋总长贝克将军、戈台勒、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谍报局的奥斯特将军以及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将军。

随后又有一段平静时期。在此期间，将军们开始希望他们已经阻止了希特勒不再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但是到了十月底，希特勒宣布进攻将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此刻，勃劳希契作为陆军总司令面临着一项抉择：要么下令发动一场他相信对德国来说势必以灾难告终的攻势，要么组织一次政变，把这个身兼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国家元首的人搞下台。

在德国，拥有发动一场政变所需的权威和力量的唯一机构是陆军。于是，德国活跃的反对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试图说服这个或那个军方领导人动用武力去反对纳粹政权的历史。人们大可争论说，指望任何一国的陆军总司令在战时发动一场叛乱，是不近情理的要求。但是，不论对道义责任这个难题抱什

么看法，事实却很清楚，陆军领导人正象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那样，拒绝采取反对派集团要求他们采取的行动。

十一月初有几天，密谋分子们满怀希望。他们争辩说，如果除掉了希特勒，就有可能同西方国家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使德国免于再遭受一九一八年那样的灾难。这个论点似乎打动了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人物，他们对于希特勒宣布在西方发动攻势的具体日期大为震惊。十一月二日和三日，反对派同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及其副手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进行了讨论。奥斯特将军得到保证说，假如希特勒坚持下达进攻的最后命令，陆军已作好了发动军事政变的准备。勃劳希契将军和希特勒已定于十一月五日星期天会见，陆军领导人答应在会见后作出最后决定。

希特勒和勃劳希契是在总理府会见的，时间不长。在勃劳希契陈述他对拟议中的进攻的种种忧虑时，希特勒十分安静地倾听着，但是当这位总司令说到在波兰的德国步兵的士气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为低落的时候，希特勒便大发雷霆，高声辱骂勃劳希契，不准他继续报告下去。在这种直接打击之下，本来似乎已经处在神经衰竭边缘的总司令垮下来了。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部的失败主义怒不可遏，断然下令继续准备，在既定的日子即十一月十二日拂晓开始进攻。

希特勒本人和希姆莱似乎都没有料到，设在佐森的陆军总司令部对发动一场政变的商谈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不过他们简直用不着担心。在受到希特勒申斥之后，勃劳希契（还有哈尔德）连忙否认对密谋有丝毫兴趣。偶然的机会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十一月七日，由于预报天气不利，进攻被迫推迟；而且陆军总司令部在整个冬季都得以利用同样的借口一再拖延，而避免重新提起主要争论之点。

当以贝克和奥斯特为核心的反对派密谋集团的希望日益黯

淡，但仍旧力图鼓动陆军总司令部采取行动时，他们惊悉有一枚炸弹把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炸毁了，其时正值希特勒在那里发表纪念一九二三年政变的演说后不一会儿。有两名英国特工人员潘恩·贝斯特上尉和斯蒂芬斯少校，据说对此次阴谋知情。他们同时在荷兰境内被劫持。还有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的德国木匠，在瑞士边界被捕，他身上带有一张标有记号的酒馆大厅内部的照片。

反对派听到这个消息吃了一惊，这并不奇怪。因为事实上这次对希特勒的暗算，是作为提高元首国内声望的手段，由秘密警察组织的。艾尔塞是一个熟练的细木工，无意中结识了一批共产党员，他曾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去“再教育”，得到秘密警察的青睐。他们向他提出，如果他听命行事，就给他自由，然后有两次在夜间把他带到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去。在那里，他奉命把一包炸药装进紧靠着希特勒演说时站立的地方的一根柱子里。有一个闹钟同炸药放在一起，但是没有和引信接上，引信只能由外来的电流引发。

纳粹的日历上固定不变的日子之一是十一月八日，这一天希特勒总要到慕尼黑去，同老战士们作一年一度的聚会，从不爽约。这一次他照常参加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庆祝活动，但是缩短了演说时间，提前离去。他走了不久，突然一阵猛烈的爆炸把大厅摧毁，炸死了几个党员，多人受伤。

希特勒的秘书当时也在送元首回柏林的列车上，后来描述他们在纽伦堡获悉这个消息时的情景。可能事先并没有人把所策划的事情告诉希特勒。不管怎样，他马上抓住他倖免于难这一点，作为上苍保佑的证据。他激动得两眼熠熠闪光，在座位上往后一靠，宣称：“现在我满足了！我比平常早离开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这个事实，证明天意是要让我达到我的目标。”^②

戈培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事件来煽动对那些对战争冷

漠的人的不满情绪，同时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位天才的领袖，只是靠他的直觉，才使他得以死里逃生。秘密警察先把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照片塞在艾尔塞身上，然后在离瑞士边境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释放了他，等他企图越过边境时，立即加以逮捕。德国报纸抓住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描绘出一幅怵目惊心的画面，其中奥托·施特拉塞和英国情报机关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曾经一度预定要举行大规模的审讯，将两个被劫持的英国特工人员置于被告席上，对艾尔塞则予以仔细的调教，要他作为主要证人证明这场暗杀是英国人组织的。但审讯始终没有举行，这说明秘密警察的精心策划失败了。时间安排得有点太凑巧了，德国人民对于天助他们的元首逃生一事，始终漠然表示怀疑。^③

希特勒推迟了对西线的进攻，但是并没有放弃他的计划。十一月二十日，第八号指令命令部队保持戒备状态，以便一旦天气好转即可立刻行动。十一月二十三日，希特勒把三军主要指挥官召集到总理府，又开了一次类似五月二十三日和八月二十二日那样的会议。我们又一次有幸得到希特勒讲话的记录，这是那时当场记下并在战后缴获的。^④

希特勒引用的论点就是他在十月十日提出的那些，但是这一次他说话随便一些，论点也发挥得更加充分。他开头先责备将军们对他以前的决定，即占领莱因兰和吞并奥地利，缺乏信心。“信任我的人为数很少。”

下一步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从一开始我就看得很清楚，我不能满足于只拿到苏台德区。那只是个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从而奠定了征服波兰的基础。我当时还不十分明确，究竟应该先动手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

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还是先对波兰作战。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打了又想打。依我看，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希特勒十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俾斯麦创立德意志帝国以来，德国第一次毋须害怕两线作战。和俄国缔结的协定并没有给未来带来安全，但是就目前而言，形势对德国是有利的。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一切都取决于墨索里尼的存在。希特勒迅速地概述了一下其他政治因素之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一切都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时机是有利的，再过半年就可能不再是这样了。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我必须毫不夸大地指出，我本人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者一个文官能代替我。可能以后还会有人试图谋刺我。我对自己的才智和决断能力深信不疑……时间对我们的敌人有利。目前存在着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后再也不可能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而只可能恶化下去……

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我将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法国和英国。破坏比利时与荷兰的中立并没有什么关系。等我们打赢了，谁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

结尾的段落表明希特勒心情振奋。由于被讲话的主题弄得飘飘然，他十分坦率地说：

一切妥协的希望都是幼稚的。不是胜利，就是失败！问题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命运如何，而是将来谁主宰

欧洲……从来没有人达到我所取得的成就。在这一切当中，我的生命是无关重要的。我已经领导德国人民登上空前的高峰，哪怕全世界现在都痛恨我们。我正在把这番事业押在一场赌博上。我不得不在胜利和毁灭之间进行选择。我选择了胜利。

我们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精神一定会使我们大家鼓起勇气来……只要我还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事情面前退缩，我要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已经决定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好让我能屹立无愧；哪怕我不得不去死，我也要消灭我的敌人……在过去的年代，我经历过许多靠直觉而知道的事例。即使在目前的事态发展中，我也看到了天意。如果我们胜利地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会胜利地通过的——我们这个时代将会载入我国人民的史册。在这场斗争中，我非存则亡。我不会在我国人民战败后苟且偷生。决不向国外势力投降，决不允许国内发生革命。

虽然希特勒设计这个场面是为了把天才领导的印象深深地印在他的指挥官的心上，但是很难相信他仍然不过是在演戏；后来几年的自大狂这时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没能说服高级将领——勃劳希契在会后提出辞职，没有获准——但是事后证明，陆军总司令部摇摆不定的疑虑肯定不足以阻挠希特勒，由于在波兰的胜利，他已经坚定了信心，决定一意孤行。将军们只能利用天气一直恶劣为借口，把发动攻势的日期大大推迟，一直拖到一九四〇年以后。

在此期间，希特勒内心感到高级将领们对战争缺乏热情，同时怀疑他们准备利用任何借口来避免作出明确的军事决定，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他对那帮职业军人的不信任感。希特勒在一

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之交的冬季同他的将领们的冲突，正如他们大部分人以后也认识到的那样，使得他们在军事问题上也不能对希特勒有所影响。在西线的进攻带来的不是他们预言的惨败，而是第二次大战中最惊人的节节胜利时，希特勒兴高采烈，认为，正如他一向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判断比他们高明一样，他在战略上甚至战术上的判断也比他们高明。以后，这给希特勒本人和陆军都带来了惨重的后果。

二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的秋冬两季，希特勒心里一直盘算着他打算在西线发动的攻势的前景。尽管接连延期，他仍然把进攻设想成是不过几天以后的事，直到新年他才不得不同意把它推迟到春天或初夏。他急于求战，在十二月，威兹萨克听他说过，在西线打一个战役“会使我损失一百万人，可是敌人也得损失一百万人，而敌人是受不了的。”^⑤但在此期间，政治情况却使他分心，尤其是由德国同意大利和俄国的关系引起的种种尴尬问题。

钢铁盟约的短暂蜜月时期早已过去了。这个同盟在德意两国都是不得人心的，希特勒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同将领们开会时承认，意大利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墨索里尼是否继续掌权。领袖本身的态度就是很不稳定的。十一月二十日，齐亚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对于墨索里尼来说，一想到希特勒正在打仗，尤其是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完全无法忍受。”^⑥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六日，墨索里尼表示了希望德国战败的情绪，他吩咐齐亚诺悄悄通知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它们面临着德国即将入侵的威胁。

但在其他时候，墨索里尼又转过头来大谈要站在德国一边介入战争。但是许多德国人对他们的“非交战的”盟国那种不加

掩饰的轻蔑，使墨索里尼始终感到愤愤不平，同时德国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也受到罗马激烈的批评。希特勒同俄国缔结协定；为了顺从俄国的意愿，连一个幅员缩小了的波兰国家也将予以消灭；俄国进攻芬兰时，德国保持缄默；德国在执行南蒂罗尔问题的解决办法时的表现——所有这些都是意大利不满的缘由。俄国人在十二月初入侵芬兰时，齐亚诺注意到在意大利若干城市有反苏示威游行——“人民说的是‘打倒俄国’，实际上指的是‘打倒德国’。”^⑦

莱伊在十二月初对罗马的访问丝毫没有消除意大利人的怀疑。不止于此，在十二月十六日，齐亚诺对法西斯社团院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对意大利的盟国拐弯抹角地批评比以前更严厉了。三个星期后，墨索里尼给希特勒去了一封信，这封信表明墨索里尼对他的独裁者伙伴闹独立到了顶点。

他开头先表达了他的“深刻信念”，认为德国即使得到意大利的援助，也不能使英法两国“屈膝，甚至不能分裂它们。如果有谁相信能够做到，那是自欺欺人。美国不会容许民主国家完全战败”。由于这个原因，他敦促希特勒说为了击败它们，谋求妥协比“不惜牺牲一切，包括牺牲政权来冒险”的好。“除非你已经下了无可挽回的决心，非把战争进行到底不可，否则我认为波兰国家的建立……将是解决战争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奠定和平的一个充分条件”。

墨索里尼这封信的主题是希特勒同俄国订立的协定的不幸后果；这包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引起的不满；在有数以千计的意大利志愿军效劳的一场战争中牺牲掉芬兰，再加上未能保存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墨索里尼反对在西线扩大战争，劝告希特勒掉过头来在东方，在俄国寻求德国的生存空间。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写道]，政治必须承认有采取权

宜之计的需要。这一点甚至对革命的政治也是适用的……尽管如此，事实上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俄国，而且不费一枪一弹。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牺牲你的革命的永久原则。我深信你不可能抛弃你挥舞了二十年的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的旗帜……而且我还有责任补充一句，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就会在意大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⑧

墨索里尼的信不但是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的证据，而且它的论点击中了希特勒政策的一个要害——德苏协定。对此，希特勒一直不是完全心安理得的。

德国同俄国的关系中的主要问题这时已经不是波兰问题了。在被瓜分之后，波兰的西部有一部分并入德国，其余剩下的地区组成总督辖区，由汉斯·弗朗克担任总督，此人在纳粹党掌权以前的不景气年代里曾经担任过党的辩护律师。十月七日，即希特勒发表所谓“和平演说”的第二天，他任命希姆莱做一个新组织“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⑨的首脑。它的头一个任务就是将波兰人和犹太人从并入德国的各个省分放逐出去。第一年，有一百二十万波兰人和三十万犹太人被迫迁徙，情状甚惨，以致许多人死于途中。

这些人被放逐到总督辖区，弗朗克在那里除了搜罗劳动力和掠夺当地的粮食物资之外，还担负“特别绥靖行动”^⑩的责任，即消灭波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蓄意的政策行动。对犹太人的处理交给希姆莱和党卫队。“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这个阴森可怕的用语，是用来掩饰党卫队在欧洲消灭一切犹太血统的男女老幼的计划的代号。它的第一阶段在波兰总督辖区实

施，到战争结束之前在奥斯威辛有将近一百万人丧生。^⑭事实上，波兰变成了纳粹新秩序的活样板。这种新秩序的基础是：消灭犹太人，把象斯拉夫人这样的劣等种族完全置于以党卫队为代表的优秀种族的奴役之下。

因此，不论俄国人先前可能怎样担心过希特勒会利用德国统治下的波兰人到苏联统治下的波兰人当中去挑动事端，由于德国人对待全体波兰人颇为粗暴，这些恐惧很快就消除了。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之交的冬天，考验德苏关系的不是波兰，而是芬兰。希特勒早先已同意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接受了把在那里长期定居的日耳曼居民从这些国家撤出的痛苦后果。此刻，他不得不默然坐视俄国人使用武力逼迫芬兰人，而这个民族和德国是有密切联系的，他们对俄国人的英勇反抗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人们的钦佩之情。对于这个不断号召全欧洲与他共同阻遏布尔什维克的人来说，扮演中立者的角色是很耻辱的。虽说如此，德国对芬兰的命运还是毫不关心，外交部训令德国一切驻外使团避免对芬兰人作任何同情的表示或批评俄国人。

希特勒一定不会看不出，俄国为加强它在波罗的海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目的显然在于保卫自己，防备德国的进攻。然而，尽管他没有耽溺在里宾特洛甫关于德苏友好的前途那些迷梦之中，可是他仍然认为同苏联合作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指望得到的好处有经济、政治和战略三方面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德苏两国又签订了经济协定。对德国来说，俄国供应的原料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希特勒在三月三十日下令，德国提供给苏联的装备应优先于向德国自己的武装部队交货。作为报答，苏联在第一年供给德国一百万吨谷物、五十万吨小麦、九十万吨石油、五十万吨磷酸盐、十万吨棉花，还有少量的其他原料，并从满洲

运去了一百万吨大豆。^⑫

德苏两国的合作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一九三九年秋天，俄国的宣传舆论和德国之外的共产党都支持德国的论点，说继续战争的责任在于西方大国——所谓的“和平攻势”。两国政府通力合作对土耳其施加压力，阻止土耳其人放弃其中立地位；还顺利地将东北欧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

但是，希特勒认为能够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战略上的。德国有可能在西线发动进攻而无需担心其东部边境的防御问题；它不但能够避免两线作战，而且还可以把几乎全部现有的兵力集结在西线。在一九四〇年战役期间，德国只留下七个师的兵力守卫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之间漫长的东部防线，甚至在战役进行过程中，还把其中两个师抽调到西线去。据戈林在战后的估计，对希特勒来说，德苏协定抵得上五十个师，这是他本来不得不保持在东线的兵力。事实上，正如进攻波兰时一样，德苏协定是希特勒在西方发动攻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象斯大林一样，希特勒也在利用一个双方都预料到不会持久的局势。优势似乎暂时在斯大林方面，但是希特勒并不气馁。如果他能利用俄国的中立来挫败西方大国，他就能够补偿损失，而且绰绰有余。如果他能横扫低地国家和法国，把英军赶到海里去并且在西方按照自己的条件媾和的话，俄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的收获就可以忽略不计。不管怎样，无须把俄国的成功看成是永久性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希特勒在同凯特尔谈到波兰前途时，对即将在总督辖区奉行的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总政策作了一个例外的规定：

从军事观点来看[他对凯特尔说]，这块领土作为进攻的前沿阵地，对我们是重要的，而且可以用于部队的战略

集结。为此目的，这里的铁路、公路和交通线都要保持完好。^⑬

希特勒把他对东方的野心暂时搁置起来，但是他并没有遗忘这些野心。

三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希特勒下令西线的进攻在一周后，即十七日的黎明前十五分钟开始。三天之后，他再一次延期。在缴获的档案中，延期指令的最后一道命令规定一月二十日是预期的进攻日。但是，在那以后一直到五月份都没有任何动静。

在希特勒作出决定的当天——一月十日——德国空军的一个参谋，在从蒙斯特飞往科隆的途中，被迫在比利时降落。他随身带着希特勒开展攻势的整个作战计划。虽然他烧毁了一部分，但落在比利时人手里的残本已足以使德国人惊慌。事情就此定局，陆军总司令部如释重负的情绪几乎是毫不掩饰的。希特勒终于认为，在冬天过去和新的计划制订出来之前，再没有必要逐日推迟开始作战的日期。

希特勒甘心作出这个决定，一部分是由于他开始对一个新方案感到兴趣。这个方案是海军总司令部倡议的。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曾因在一九三九年爆发战争而感到失望。他相信，到一九四四年，本应会有一个“彻底解决英国问题的良机”；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德国既无足够的水面舰只，也没有足够的潜艇来认真地向英国的海军霸权地位发起严重的挑战。

雷德尔在寻求一种手段来增加海军攻击英国海上航道的能力时，想出了在挪威取得基地这个主意。十月三日，他要求海军参谋部对若干个关于挪威的问题准备答案，十月十日，在元